

科技文化

中國生理學與醫學發展側影

《中國生理學雜誌》：一本前沿研究學報

饒毅

最近接觸到早已發黃的老雜誌《中國生理學雜誌》，瀏覽其中的作者和文章，心中生出許多感慨。記錄這本雜誌的盛衰，以及它和協和醫學院的密切關係，也許對史學家日後研究二十世紀中國生物學和醫學的起步不無參考作用。

《中國生理學雜誌》於1927年創刊，至1950年停刊，其間共出版了17卷：1927至1940年出第1至15卷，1941到1948年合出第16卷，1949和1950年合出第17卷。這出版情況，簡單明確地反映了中國社會在40年代的劇烈動盪。在當年，這本雜誌對中國的生物學和醫學研究是很重要的。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圖書館收藏了兩種在那一時期由中國出版而又在國際上發行的生物醫學雜誌，一是《中華醫學雜誌》，另一就是全部17卷的《中國生理學雜誌》了。

《中華醫學雜誌》由在華傳教士醫學會出版，創刊年代早於《中國生理學雜誌》，內容則以臨牀醫學為主，最常見的文章是病例報告，這在當時自然很重要和有用。

至於1927年創刊的《中國生理學雜誌》則是研究性的學報，它由林可勝、安爾(H.G. Earle)、伊博恩(B.E. Read)和吳憲等共同主編。他們四位，除安爾在香港以外，其他三位都任教於北京協和醫學院。這所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創辦的學校，與大部分西方在中國辦的學校有一個不同：它在早期雖然與教會有關，但後來卻並非由教會資助或主辦，而且特別注重研究工作。通過《中國生理學雜誌》，我們可以立即見到北京協和醫學院對中國醫學發展的重大貢獻，因為雜誌的三位創辦者林可勝、伊博恩和吳憲分別為該院生理學系、藥物學系和生物化學系的系主任。

雜誌的內容包含生物學、基礎醫學、臨牀前醫學甚至臨牀醫學研究。這種覆蓋面，一方面固然與當時的科學發展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創辦者一開始就不侷限於「生理學」一門學科有關。所以，有關生物化學、藥理學、營養學、病理學、生理心理學、藥物學等的討論從開始就在雜誌中出現；一些與臨牀醫學有關又有實驗研究的課題，也常被刊載。事實上，該雜誌兼容了當時的實驗生物學和實驗醫學兩個領域中大部分學科。

這本雜誌刊載的文章均以英文發表兼附中文摘要，水平極高，某些方面更達世界一流水平，這是以後好些同類中文刊物不能相比的。舉例來說，生物化學家吳憲和他的同事(包括吳夫人嚴彩韻)自20年代起所發表的一系列蛋白質變

性的文章，對這領域有重要貢獻，這些文章除了兩篇在日本和美國生物化學雜誌發表外，其他就都發表在《中國生理學雜誌》上。此外，林可勝的學生，著名生理學家馮德培^①自30年代中起，在這本雜誌上連續發表了26篇有關神經肌接頭的論文，推動了神經生物學在三個方面的前沿研究。因此，當時在澳大利亞、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英國生理學家埃科斯(J. Eccles)就常常等着看《中國生理學雜誌》，為的是要知道馮德培有甚麼新的研究成果發表。

這本雜誌所形成的風格，所建立的標準，對中國實驗生物學和實驗醫學的發展是有很大影響的。它的編輯和作者分布於生物學和醫學各個領域，例如林可勝是生理學在中國發展的奠基者，他還創立了國防醫學院(現在上海的第二軍醫大學)。在他和《中國生理學雜誌》培育下成長的年青學者馮德培，是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的開創者。和他同時的吳憲也有傑出的科學貢獻(哈佛醫學院的Folin-Wu學術報告廳就是以他命名)，並直接培育了不少中國生物化學家。他的兒子吳瑞(Ray Wu)是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吳瑞於80年代初組織的「中美分子生物學聯合招考」(CUSBEA)，又為培養新一代中國生物學家起了作用。

在臨牀醫學科學家中，林巧稚早期隨伊博恩做過麻醉藥物作用的研究，成果亦發表在《中國生理學雜誌》上。她以後在婦產科的貢獻，已為人熟知。內科學的張孝騫，也在這個雜誌上發表過研究糖尿病人血液中磷含量變化的論文。張孝騫畢業於湘雅醫學院，受過良好醫學教育，對中國消化內科學的發展曾有重要貢獻。他在協和的科學研究訓練以及為《中國生理學雜誌》之類刊物撰寫論文的經驗，對他成為醫學科學家是有重大影響的。

《中國生理學雜誌》後來變成兩本刊物，一本是在台灣出版並沿用同一名稱的雜誌，另一本則是大陸從1952年起出版的《生理學雜誌》，它翌年即被迫更名為《生理學報》，但在主編馮德培的堅持下，加上了一個小字號的副標題：繼續《中國生理學雜誌》。這兩本刊物至今仍在出版，但在很長時間內難以保持原有水平。

從《中國生理學雜誌》的成長和遭遇，可以體會到中國科學發展的曲折和困難，但更可以見到它的頑強生命力。

註釋

① 饒毅：〈紀念世界著名神經生物學家馮德培〉，《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4月號，頁102-107。

饒毅 三藩市加州大學生理系神經科學博士，在哈佛大學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系做博士後，現任教於華盛頓大學解剖和神經生物系神經生物學系，並兼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中心研究員。曾在 *Nature*, *Science* 等期刊上發表研究論文。

協和醫學院的起源

吳階平

北京協和醫學院在中國現代醫學(包括基本和臨牀醫學)教育發展史上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大批畢業生對中國醫藥衛生的直接貢獻是大家公認的了。但這間醫學院的起源也許知道的人不多，值得一談。

協和的前身是由六所教會聯合主辦的「協和醫學院」(Union Medical College)，它之所以會蛻變成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性醫科學院主要應當歸功於一位眼光遠大的前浸信會牧師蓋斯(Frederick T. Gates)，他在1892-1923年間是大財閥老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主要財務與慈善捐款顧問，因此又稱為洛克菲勒的「外在良心」。他的一個堅定信念就是學術醫學就是當代的神學，而人口眾多的中國則是最急待關注的。

在蓋斯的統籌和推動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1913年成立，它的董事局在1914年初舉行「中國問題討論會」，且隨即達成了基金會在中國的工作應以醫學為主，並應盡量利用現成架構這一基本決定。在其後短短兩、三年間，基金會就派出了兩個考察團來華仔細調查了全國醫學教育和衛生狀況，並且作出在中國進行長期、大規模和最高水準醫學教育與研究工作的重要建議。在這建議下，基金會所支持的「中國醫學委員會」買下了「協和醫學院」，訂定了新的收生、教師招聘(以研究能力為主)和五年課程制度，委出了首任院長，正式建立「北京協和醫學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即 PUMC)，它的第一屆預科班於1917年9月入學，同時舉行了新校舍的奠基禮，這上距「中國問題討論會」還不足四年光陰。

協和醫學院的迅速發展和追求卓越的精神並非偶然的，它得力於兩個時代背景的結合：其一是美國醫學教育本身的革命，這以1901年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的建立以及霍金斯大學醫學院院長衛爾殊(William H. Welch)出任所長為標誌；其二則是辛亥革命所帶來的重大變革，以及在全世界眼中這變革為中國所帶來的新氣象、新希望，例如，美國之退還庚子賠款，用以建立後來對中國有重大影響的清華學堂以及留美獎學金，就正是在1911年。當然，蓋斯和洛克菲勒父子的熱心與遠見又是使這背景產生新發展的動力，那也是不可忽略的。

* 本文是本刊編輯部根據吳階平教授編寫而未曾發表的6頁詳細提綱撮要撰成，因未及請吳教授過目，如有錯誤，由本刊負責。

吳階平 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學院院士，協和醫科大學教授，曾任協和醫科大學校長和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

林可勝：中國生理學和國防醫學奠基者

海外華僑對近代中國的貢獻是大家經常提到的，但重點多在為革命或抗日而捐輸財富。其實華僑以學識與才幹來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也絕不乏人，像原籍福建廈門的星加坡華僑林文慶、林可勝父子，就是非常傑出的例子。



1950年代風度翩翩的林可勝

林文慶是醫生，也是廈門大學的創校校長，至於他的長子林可勝(1897-1969)則自幼在海外成長，在愛丁堡大學受醫學教育、任講師、取得醫學博士資格，直到1924年將近三十歲的時候，才決然拋棄在西方世界一帆風順的事業，回到中國人的世界，出任北平協和醫學院的生理學系正教授和系主任，成為該校第一個獲得這地位的中國人。這一大轉變表面上十分戲劇性，實際上則很可能是自幼受到父親培育熏陶的結果。否則，其後他為中國醫學發展以及抗日工作而廢寢忘餐的那種無私精神便難以理解了。

從1924至1949年這二十五年間，林可勝的事業恰好分為前後兩段。在前段(1924-1937)他是學者：推動生理學教育與研究、創辦「中國生理學協會」和《中國生理學雜誌》，更曾當選為中國醫學會會長。在後段，蘆溝橋炮火打破了平靜的實驗室生活，把他推上前線。在抗戰期間，他捲起袖子，主持貴陽紅十字會的救護工作，並兼任軍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主任。事實上，抗戰軍隊的整個救護系統，就是由他一手建立：這包括了前線六百餘所臨時醫院，後方二百餘所傷兵醫院，還有經他訓練出來的上萬衛生救護人員。他的過人精力與醫學和領導才能，當年是傳頌一時的。

抗戰結束之後，他被委任為軍醫署署長，建立國防醫學中心(其後分別演變為上海的第二軍醫大學和台灣的國防醫學院)，又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這正好標誌他在生理學和國防醫學這兩方面的重大貢獻。1949年他飄然赴美，先後出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研究員和邁爾斯(Miles)醫藥學研究所所長，以迄1967年退休為止。

在氣質和風度上，林可勝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國紳士，(據說，他擅長素描，其所以和愛丁堡一位醫學教授的女兒結下姻緣，就起於私下描繪她的倩影。)但就事業和貢獻而言，又有誰能懷疑Bobby(這是他的朋友對Robert K.S. Lim的慣稱)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呢？

* 本文由本刊編輯室撰寫，主要資料取材於 S.C. Wang: *The Pharmacologist* 12 (1), 24 (1970)，又據1954年左右的一段《星島晚報》剪報。文內資料主要由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布朗大學鄧崗教授和華盛頓大學饒毅教授提供，謹此致謝。